

“从语境出发”：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文化研究专题教学

盖 琪 (Gai Qi)¹

摘要：文化研究教学作为高校文艺学教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文艺学教学过于文本化、学理化等老问题进行修正的尝试。多年来，在文化研究教学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激发学生针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思考的兴趣，一直是相关教学设计的要点和难点所在。实践证明，从学生本身所处的时代语境出发，以兼具文本性与语境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专题设置方式展开文化研究教学，应该能够成为激活高校学生主体探究潜力的一条新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研究；专题性教学；时代语境

Title: “Starting from the Context”: Specialized Teaching on Cultural Stud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bstract: As a branch of the literary studies teaching system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teaching of cultural studies largely stems from attempts to correct the long-standing issues of excessive textual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in literary studies teaching. Over the years, how to better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connect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to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deeply reflecting on real-life issues has always been a key point and a challenge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studies teaching. Practice has proven that starting from the temporal context in which students themselves are situated and organizing cultural studies teaching through topics that integrate textuality with contextuality, historicity with contemporaneity, and locality with globality can become a new approach to activating the potential for independent inquir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Specialized Teaching; Temporal Context

引言

在中国内地高校的课程体系里，文化研究的相关课程通常以汉语言文学专业、艺术学专业的学生为主要教学对象，一般会被归在文艺学的框架下。这使得这门课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显示出一种

¹ 盖 琪 (Gai Qi)，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广州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社会兼职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评审专家、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评审专家、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委会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视听传播专委会常务理事等。研究方向：媒介文化研究、影视艺术理论。电邮：qigai2000@hotmail.com。

从文艺学沿袭而来的较为浓厚的理论色彩。即在大多数教学场景下，这门课的教师会以介绍西方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的理论为主，再辅以一定的文学或艺术案例对理论进行解释，而目前可见的相关教材也多是按照这一逻辑进行编撰的。如果仅从学术逻辑上来看，这种教学进路是具有系统化优势的，但其问题则在于，对大多数理论兴趣尚未建立，或不打算以学术研究为业的学生来说，这门课的内容往往显得偏于晦涩，不易进入，难以领悟其中所蕴含的理论魅力，更难以通晓其同各种专业实践工作之间的有机联结。而对于授课教师来讲，在这种教学范式下，由于教学内容较为固定，来自学生的教学反馈又往往较为淡漠，所以也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

基于上述问题，在过去三年中，笔者尝试以一种专题性的方式对文化研究教学的课程内容进行重构。重构后的课程以笔者最新的科研成果为基础，特别注重从时代语境出发，打通课程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地方性与全球性，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先后获得了校级和国家级的教改项目支持。由此，在接下来的文字中，笔者就将对文化研究教学在中国高校被寄予的使命进行简要的耙梳和观照，进而对自身在文化研究的专题性教学过程中所收获的一点心得进行总结和分享。

一、文化研究教学使命回溯：探索富于语境意识的文艺学教学范式

学理地看，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并不等于“对文化的研究”。在今天的文学学界，它通常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该方法“20 世纪 60—70 年代在英国出现，70—80 年代扩散到欧美世界并产生巨大影响，90 年代以后进一步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张均，2024，p.132）。因此，从根源上看，它对中国而言确实是一个舶来品。但是作为一种教学范式，它被引入中国内地的过程却是与本土语境的嬗变过程深切交织的，是中国高校文学专业积极因应国家社会现实发展需要的产物。

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19）》一书中，陶东风与和磊对文化研究教学进入中国内地高校的原因做出了回顾，他们指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大众传媒蓬勃发展，消费社会急速形成，日常生活中的文艺成分和商业成分日益交融，中国社会与全球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所有这些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都促使越来越多的文艺学研究者意识到，不能再仅仅停留在文学的内部去分析文学，而是需要更多地打开既有的知识边界，借鉴更多社会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来对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观照与阐释（陶东风，何磊，2019）。在这种学理潮流下，一些高校的文艺学教学也逐渐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是反思过于偏重文学本体的文艺学教材编撰路径，同时尝试引入更关注文学与时代语境之间深层关系的文化性视角和理念。

正是在这样一种趋势下，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更重视“外部性”的思考与研究范式，开始被引入高校的文艺学教学体系。因为在文化研究的视野里，“文化”主要指向的是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价值观念；而文化研究要做的，实际上正是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之间的深层联结与交互嬗变进行审视（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对各种权力关系的潜在作用进行揭示），所以当以文化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向学生讲授文学艺术时，文学艺术就不再仅仅被看成是已经完成了的静态作品，而是会在更大程度上被看成是处于动态中的人类实践活动。由此，即使是一部已经问世了很多年的经典文学艺术作品，它在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上也仍然可以被视为是动态的，因为它还在不断拥有新的读者，它还在通过新的读者的阅读行为与新的时代建立关系。而如果它被改编、翻拍、重写，那么就等于是在更大程度上转化成了当代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西游记》

和《红楼梦》，就都是这种始终在和不同时代的新读者建立“对话”关系的作品，都是在不断地以新的美学面貌，对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做出标识的作品。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理解它们作为古典小说巅峰之作的文本特质，与理解它们作为当代文艺创作/接受底本的语境缘由是同样重要的，后者对理解接受者自身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更有意义。

从高等教育教学的角度来看，引入文化研究所偏重的过程性、实践性的视角，本应是很有利于引导当代大学生更好地在文学艺术与自身所处的现实生活之间建立联结的。文化研究强烈的语境意识，使其一方面有愿望超越文学的边界，对数字时代各种新兴的文艺形态做出阐释；另一方面也有能力关注当下的个体，对大学生自身的审美经验做出回应（陶东风，2001）——这两方面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对文艺学教学容易陷入的板滞状态形成纾解，因而也正对应了文化研究在被引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过程中所被寄予的时代使命。但在最近十余年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身处于文艺学框架下的文化研究教学，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延续了文艺学教学浓郁的理论色彩，在与学生所处时代语境的结合度上往往显得不甚理想。

以市面上比较通行的两种文化研究的教材为例——两本教材均名为《文化研究导论》，一本是由陶东风等人翻译的英语教材的中译本，全书分九章，先介绍文化研究的基本视角、方法和目标，然后再分别介绍文化研究在空间、民族、身体、现代性、视觉文化、青年亚文化等问题域中的操演，包括代表性理论家和理论观点等，由此等于是正式将文化研究引入了中国高校的教学体系，奠定了文化研究教学在中国的基本结构框架（阿雷恩·鲍尔德温，2004）；另一本则是由陆扬和王毅所撰写的本土版本，全书除绪论外分为十五章，在依次介绍了文化、文化现代性、文化社会学、文化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等基础性概念和思潮之后，才逐渐展开对文化研究理论视角和方法的介绍，由此使其相对于第一本而言在导入逻辑方面显得更为清晰，因而对初学者来说显得更为友好。而且，在第二本中，作者还特别加了“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一章，里面涉及了一些非常本土化的案例，比如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去分析上海的酒吧文化、咖啡馆文化等，由此更便于本科层面和硕士研究生层面的学生理解和接受（陆扬、王毅，2021）。但总体上，这两本教材还是非常理论化的：二者总体上都采取了从理论切入，以理论为结构逻辑和写作重点的体式，案例所占的比重相对而言小得多，尤其是跟中国本土之间的关系都十分薄弱（第一本是舶来品，没有本土案例；第二本全书将近 500 页，真正涉及本土案例的部分仅有 20 多页）。作为基础的理论向导，它们是框架精当、贡献卓越的；但是如果在文化研究的教学过程中仅仅使用它们，则对于本科生和刚刚入学不久的硕士研究生来说仍显得艰深晦涩，一时难以把握文化研究的学习目标和进路。

如前所述，相对于传统的文艺学而言，文化研究的优势本就在于强烈的语境意识，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从现实的矛盾运动中生长起来的知识探索过程。所以，在文化研究的教学过程中，这种特点其实是完全可以被彰显出来、形成特色的。例如，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经常带领学生就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到相关的城市和乡村现场去进行调研，从而很好地形成了其文化研究教学的“问题性”和“事件性”特质（王晓明，2010）。而在笔者目前任教的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由于文化研究在这里不是一个独立招生的系或者专业方向，所以很难在社会学层面上充分展开教学，但是，在导论课程的基础上，从一种更关注案例、更关注本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案例带出理论而不是以理论带出案例的角度去建构一门专题性课程，则是可能的，也是更贴近文化研究教学所被寄予的时代使命的——而这正是笔者最近三年来

尝试开设《文化研究专题》的核心理念所系。

二、文化研究专题教学的首要进路：以历史为本，建构现实关怀

笔者开设的《文化研究专题》是一门以面向汉语言专业高年级本科生为主的专业选修课，同时也正在向戏剧与影视专业硕士的课程系统中拓展。实际上，这门课除了主标题之外还有一个副标题，因而其全称显示为《文化研究专题：百年中国现代化与大众文艺表达》。而之所以要加上这个副标题，其主要目的正在于强调该课程从语境意识出发的首要进路——即该课程要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大时代语境的历史性梳理为前提，观照中国独特现代化经验与大众文艺表达（包括文艺的创作与接受等实践）之间的深层关系，由此向学生指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所引发的种种价值观念的激烈震荡，以及这些震荡究竟是如何在不同时代的文艺作品中被编码和解码的。

不难看出，该课程的核心话语实际上是“现代化”。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现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一百余年来所经历的最为重要的物质和意识生产过程。自晚清以来，“现代”就作为一种与“前现代”差别巨大的生产生活方式，携带着一套与之相适配的价值观念，成为了中国人对自身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不断进行校准和建置的参照系统。可以说，我们一直走在“现代化”的路上。而近年来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则更说明了把握“现代化”基本内涵和外延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由于我们高中语文、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教学方式和内容的僵化和套路化（当然也包括大学公共政治类课程所存在的一些类似问题），使得绝大多数年轻人对很多经常使用的概念术语不仅不够理解，甚至可以说得上是“陌生”的，而“现代化”就是这样的术语之一。就笔者接触过的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学的本科学生来看，大多数学生即使到了大三，也说不太清楚究竟什么是“现代化”，而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其在学理上的来龙去脉，那就更是显得茫然了。

这种情况值得引起重视。因为从当前高等教育非常重视的课程思政的角度来讲，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什么是现代化，当然也就无法很好地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什么特殊性，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念和方针的认知，也就必然停留在一种囫圇吞枣的状态中，流于死记硬背的形式操作，而无法转化成真正内在的精神动力和信仰。从文化研究教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不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人在近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在进行文艺表达和接受过程中的所寄所感，也就无法真正理解社会主流价值变化的原因与路径等。

只有懂得历史的人才会真正关心现实。从历史出发讲述中国，是培养学生现实关怀的必由之路。为此，在《文化研究专题》这门课上，笔者会在课程导入部分拿出一到两个课时的时间，从历史的角度专门去梳理“现代化”的起源和流变问题。相关讲述的历史逻辑在于：最早的现代化进程源于西方国家，而中国在19世纪中期被卷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因而这一进程对于中国来说是“后发”的。这里的“后发”联结着两个要点：第一是指就时间而言其在中国比在西方国家起步晚，因而有种种“赶不及”；第二是指就文化而言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外来范式而不是内生范式，因而有种种“不称”。可以说，中国在自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时间里，一直在致力于超克由“后发”所带来的这两点问题，这是理解中国现当代社会各种重大实践深层动机的一条贯穿性历史线索。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正是在这条贯穿性历史线索的基础上，在中国近四十年经济、政治、

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更具国族主体意识的命题；它标志着中国在基本完成了对于“后发”境遇的超克之后，要对西方现代化的范式进行更为系统的反思，以此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做出更具原创性的贡献。

以上述历史逻辑为基础，《文化研究专题：百年中国现代化与大众文艺表达》课程的基本结构也按照历史性原则进行了设计。课程目前主要分为四大专题，分别是“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与功夫叙事”、“百年中国现代化情感与情节剧叙事”、“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与、主旋律’叙事”、“百年中国现代化想象与‘女性故事’”。从标题可以看出，每个专题都按照时间顺序对于代表性文艺作品进行了梳理，在梳理过程中，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的现代性想象获得了重点勾勒。换言之，中国人在百年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历史阶段如何通过具体的文艺作品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心理、诉求和期待，成为每个专题讲述的核心旨趣所在。

以第一大专题“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与功夫叙事”为例，该专题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创造霍元甲’：20世纪早期后发现代化语境下功夫叙事的文学发生”，主要内容是以20世纪20年代文学场域中出现的第一个功夫英雄形象霍元甲为切口，阐述功夫叙事从武侠叙事中分化出来的关键原因——既在于新知识分子对在西方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身体观念进行传播的愿望，同时也在于民间对在在后发现代化过程中所积累的情感压力进行纾解的诉求；第二部分题为“‘打造Low-Tech’：20世纪中期租借现代化语境下功夫叙事的视听拓进”，主要内容是以20世纪50到70年代香港电影场域中出现的“黄飞鸿”和“李小龙”等功夫英雄/明星形象为基点，阐述功夫叙事进一步发展繁荣的主要原因——虽源于海外华人对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里建构现代民族身份的尊严性期待，但也催化了对西方身体标准进行迎合的文化潮流；第三部分题为“‘重构新认同’：20世纪后期全球现代化语境下功夫叙事的责任与机遇”，主要内容是对20世纪80到90年代功夫叙事在中国大陆的风靡进行审视，并对其在好莱坞遭遇挪用的情况进行介绍，由此说明功夫叙事在繁华背后的危机；第四部分题为“‘Z世代还需要功夫吗？’：21世纪后全球化时代功夫叙事的诗学困境与前景”，主要内容是对新世纪以来功夫叙事逐渐陷入困境的原因进行分析，并由此对时下正在发生的代际意义上的身体观念变革加以阐释。

从以上简要介绍可以看出，这一大专题并非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代表性作品和现象，而是在时序基础上，以功夫叙事为线索，梳理并指认出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大众文艺领域的表征要点。这其实就是一个以具体案例教给学生们如何使用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去看待、分析文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在案例分析过程中，该专题有机地征引了身体、后殖民、后人类、文化身份、数字媒介理论等重要的文化研究理论，以案例带理论，为学生们提供了更为生动流畅地进入理论的可行方式。目前，《文化研究专题：百年中国现代化与大众文艺表达》正在由一门本科高年级专业选修课建设为一门同时面向专业硕士的研究生选修课，其核心目的就在于要将这些从中国历史现场生长出来的学理思考传授给未来的艺术创作者，使其对文艺创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建立更为充分的自觉意识。

三、文化研究专题教学特色创新：以地方为本，建构全球视野

除了历史进路之外，《文化研究专题：百年中国现代化与大众文艺表达》课程的另外一个创新点则在于其明确的在地性或者说地方性。在课程中，伴随着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耙梳，笔者

着意征引了大量植根于广东历史、具有广东特色的案例，由此努力建构一种“中国现代化在广东”的讲述风貌。笔者认为，这种“关心附近”、“把学问做在脚下的土地上”的精神和方法，正是文化研究教学最应该呈现给学生的东西。

《文化研究专题》将地方性作为课程创新的重点，绝不仅仅是因为该课程开设在广州高校里、面向更多广东籍学生的缘故。而是因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广东地区确实具有特别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和现实价值。在近代史上，广东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现代文明的地区——从 17 世纪晚期开始，广东就正式加入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全球贸易系统；而从 18 世纪中期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前，广州则被留置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由此受到西方现代贸易和文化的深入影响（曾国富，2013）；鸦片战争后，广东更成为了各种现代观念/行动在中国的实验田和策源地，由此诞生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廖仲恺等大量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至关重要推动作用的巨擘（刘圣宜、宋德华，2018）。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广东则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桥头堡，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改革开放开拓精神、进取意识的象征符码。直到今天，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推进还是发挥着非同一般的先行示范作用。因此，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立足广东，为课程注入地方性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中国的现代化经验现场进行深入观照的过程。换言之，从中国道路的角度来看，广东的现代化发展链条是非常完整的，是能够贯穿历史与现实、地方与全球的，这既是广东的特色所在，更是广东对现当代中国的贡献所在、使命所在。

由此，在课程中，笔者从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引入了大量“中国故事”意义上的“广东故事”（包括人物和事件等）。比如前面提到的第一大专题“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与功夫叙事”，聚焦的就是在广东本土非常有影响力的功夫文化。但与既往对功夫文化的研究和讲述不同的是，在《文化研究专题》的课堂上，笔者不仅仅是把功夫当作一种地方特色体育项目来讲，也不仅仅是关注功夫电影的美学表达技巧、功夫明星的海内外影响力等已经被各种课程反复讲述过的内容，而是通过大量的史料搜集和文献整理，引导学生关注“功夫”背后的现代资产阶级革命背景，即关注功夫和功夫组织在近现代广东本身就是彼时广东人民抗击内部暴政与外来侵略、探索现代国家建设道路的伟大革命实践的历史事实——所有这些才是功夫后来能对地方精神、民族精神形成有效承载和指认的现实和情感基础。换言之，课程的深层设计理念在于：只有充分认识到文艺表达背后的物质性和社会性，才能真正培养出扎根本土的研究者和创作者。由此，在今后的专业硕士教学中，笔者还计划安排学生到辛亥革命纪念馆、李小龙祖居、佛山蔡李佛拳纪念馆等相关文博场馆进行参观，以期通过更具现场感的观摩和教学，进一步对学生的感性学习能力加以激活。

再如，第四大专题“百年中国现代化想象与‘女性故事’”也同样有意识地注入了鲜活的地方性视角。这一专题的设计初衷同样是对作为“中国故事”的“女性故事”做出考察。即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女性作为一种形象符码，在许多有影响力的大众文艺文本中都承担着指示现代化想象的作用。换言之，在这些文本中，性别特质往往为全球化语境下的国族境遇与韧性的表达提供了上佳能指。基于这一点，该专题专门设置了小标题为“‘重返全球体系’：20 世纪末现代化上升期的女性发展故事”的一节，在这一节中，笔者引导学生，从现代化想象的角度，对 20 世纪 80 到 90 年代形成较大文化影响力的“岭南影视剧”中的“女性故事”进行了分析，对象包括《雅马哈鱼档》、《特区打工妹》、《外来妹》、《情满珠江》、《和平年代》等著名作品。总的来看，在这些影视

作品中，女性形象脱离旧的伦理和经济框架束缚、追寻新的个体化致富之路的人生轨迹，正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乃至整个中国奋力突破后发困境，把握国族前进方向的最好喻证。课堂实践证明，当将这种地方性的国族意涵阐释给学生之后，这些老电影、老电视剧往往就会在学生眼中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透过不够清晰的影像和略显过时的剪辑手法，当下的年轻人与三十多年前激情的时代氛围其实是能够产生意义共鸣的。

另外，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探询课程地方性的过程，往往也是在知识和个人情感之间真正建立起联结的过程。文化研究本身就非常重视个体生命经验向学术问题的转化，文化研究教学也应当如此。在《文化研究专题》的课堂讨论和交流过程中，很多学生在专题框架下，回忆起自己在幼年时代，同父母一起收看功夫影视时欢欣鼓舞的情形，或者是在体会到“女性故事”中的社会意涵时深受触动的情形——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回忆都是个体开始进入到文化研究所注重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联结系统之中的契机，它们既构成每个学生自己所处的小语境，也成就了我们共同所置身的大时代。

结语

总的来说，在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和实践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文化研究的专题教学是一条特别值得持续开掘探索的高校文艺学教学进路。这一进路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激发学生针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思考的兴趣，而且有利于提升教师本身的专业素质，促使教师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不断地通过引入新的案例和新的科研成果，在知识教育的同时更好地展开思政教育，由此为建构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做出切实贡献。

基金项目：2023年度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题案例项目（项目编号：ZT-231107803）阶段性成果；2023年度广州大学校级教材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2004）：《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Elaine Baldwin etc (2004).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 translated by Tao Dongfeng etc.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刘圣宜、宋德华（2018）：《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Liu Shengyi, Song Dehua (2018). *A History of Modern Lingnan's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陆扬、王毅（2021）：《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Lu Yang, Wang Yi (2021).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陶东风（2001）：“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5）：97-105。
[Tao Dongfeng (2021): "Reflections on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ry Studies in Universities", *Literary Review* (5): 97-105.]
- 陶东风、和磊（2019）：《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1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ao Dongfeng, He Lei (2019). *Research on Literar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49-2019 (Volume II)*.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王晓明（2010）：“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17。
[Wang Xiaoming (2010). "Three Dilemmas in Cultural Studies: Taking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Shanghai

-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5-17.]
- 曾国富（2013）：《广东地方史（古代部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Zeng Guofu (2013). *Local History of Guangdong (Ancient Part)*.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张均（202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
- [Zhang Jun (2024). *Research Method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Press.]